**Jim Spiegel 博士，《宗教哲学》，第 11 节，**

**神圣的隐秘**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的宗教哲学教学。这是第 11 节课，神隐性。

好的，现在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有神论者（特别是基督徒）面临的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是最近几十年通过一位名叫谢伦伯格的学者的工作而出现的，那就是神隐性问题，一些人认为这是邪恶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问题，它只是与上帝没有让自己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也没有让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存在这一事实有关。

这难道不是个问题吗？我们该如何调和这一事实与我们也认为上帝希望人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这一信念？因此，彼得·范因瓦根 (Peter van Inwagen) 这样总结了神隐性的问题：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上帝存在，他可以提供他存在的明确迹象。因此，如果他存在，上帝就会提供他存在的明确迹象。

然而，上帝存在的证据却并不存在。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上帝是否存在。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假设所有这些前提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有效的论点，然后我们就会面临一种对有神论理性信仰的反对。

范因瓦根指出，即使没有邪恶，也可能存在神隐的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人犯下任何罪恶或道德邪恶的世界；没有偷窃，没有撒谎，也没有强奸或谋杀。你也可以想象，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痛苦，人们不会生病，没有癌症，没有心脏病。

事实上，没有身体伤害。即使在没有痛苦和道德邪恶的世界中，仍然可能存在神隐的问题。人们想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仍然相信上帝，但仍有其他人可能不确定。

因此，神隐的问题似乎与邪恶的问题截然不同。正如范因瓦根所说，在一个没有任何真正痛苦的世界里，神隐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问题。范因瓦根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神不在乎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他，这是他的重点，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上帝确实关心人们如何开始相信他，或者为什么相信他。因此，范因瓦根说，无处不在的奇迹，比如天空中不断出现的神谕之类的东西，只能促使人们单纯地相信上帝，而不是个人的转变。上帝关心的是重大的个人转变，而他的隐秘性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这使得这种转变，或者说这种转变的性质，比没有这种转变时更加重要。另一位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的学者是迈克尔·默里。他将自由意志神义论应用于这一问题，并问道，人类自由意志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当谈到自由选择或接受上帝并决定追随上帝、服从他并与上帝建立关系时，我们自由选择和追随上帝的必要条件是什么？默里指出，需要获得某些条件，比如，特别是，对不起，有些条件是不能存在的，特别是在威胁背景下的强迫，对吗？为了让我们自由地选择上帝，我们不能被迫这样做，比如被一种如此令人难以抗拒的威胁所强迫，以至于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上帝并追随他。

所以，这就引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构成了重大威胁？Murray 讨论了与威胁重要性相关的许多因素，他感兴趣的是看看上帝如何减轻地狱的威胁，减轻那些不追随他的人遭受的痛苦和惩罚的威胁。如果他能减轻这种威胁，让它不那么严重，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上帝。

我们不会有这种感觉，也不会那么被迫。所以，这里有一些与威胁重要性相关的因素，它们突出了上帝可能减轻威胁重要性或使威胁不那么强烈的一些方法。其中一个因素与一个人认为威胁后果对他或她有害的程度有关，而这只与威胁强度有关。

另一个是威胁迫近性，即在特定条件下，一个人预期后果发生的程度。Murray 指出了三种谈论威胁迫近性的方式。一种是概率威胁迫近性；如果我不转向上帝，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间威胁迫近性，在我拒绝上帝之后，这种情况会在多久内发生？认知威胁迫近性，这与威胁的明确程度和明确性有关，最后，还有对受到威胁的人的肆意妄为的考虑，这与受到威胁的人无视自身福祉的程度有关。

如果一个人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的命运，那么你知道，任何终极痛苦的威胁都不会对他们产生太大影响，所以这将是缓解威胁的一种方式，确保人们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最终命运。所以，这些都是 Murray 讨论的与威胁重要性有关的不同变量。现在 Murray 得出结论，威胁的强制程度与威胁强度和紧迫性成正比，与受威胁者的肆意程度成反比。

威胁强度越大，威胁越紧迫，那么强制程度就会增加。一个人越放荡，对吧，他们就越不关心自己的最终福祉，那么强制程度越小，他们就越关心自己的福祉，那么威胁越大，他们越不关心，威胁就越小。因此，面对邪恶生活的地狱威胁，人类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减轻这种威胁，那么这三个因素中的哪一个可以减轻以降低威胁程度呢？那么，威胁强度是上帝选择降低威胁程度的方式吗？默里指出不是。

永恒的诅咒，永恒诅咒的威胁，是最强烈的威胁，对吧？你可以用诉讼来威胁你不喜欢的人，或者用身体威胁他们，比如我要打你鼻子，但没有人有能力用永恒的诅咒来威胁某人，但上帝在经文中多次这样做，所以他没有选择那条路。那么受到威胁的人的肆意妄为呢？上帝是否让人们不真正关心他们的最终福祉？不，我们确实关心我们的最终福祉，即使上帝这样做，那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关心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福祉是一种善和美德。那么，威胁的迫近又如何呢？威胁的力量和受到威胁的人的肆意妄为，如果他不调整这些以降低威胁的重要性，那一定与威胁的迫近有关。

那么威胁迫近的概率又如何呢？嗯，不，圣经中明确指出，对于那些邪恶和拒绝上帝的人来说，地狱之苦是必然的。这在圣经中肯定是明确的，所以上帝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威胁的重要性。那么威胁的时间重要性呢？默里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因为不服从和邪恶的人不会立即被投入地狱。

还有时间，你还有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即仅凭时间因素，威胁会减轻多少。但由于人们不会立即陷入地狱，因此确实会减轻一点威胁。

但默里关注的第三个因素才是上帝降低威胁重要性的关键方式，即认知威胁迫在眉睫。根据默里的说法，这是上帝降低威胁重要性的手段。上帝通过隐藏自己，使威胁在认知上变得模糊不清。

因此，这就是 Murray 的论点的结论：神的隐匿性似乎服务于这一重要目的，即保护人类服从或不服从的自由。上帝是隐藏的，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隐藏，这一事实使他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足以降低地狱终极惩罚的威胁，使那些选择上帝的人能够更自由地这样做。他们不那么被迫正是因为上帝在一定程度上是隐藏的。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方式。谁知道上帝的想法，他当时在想什么，或者为什么会这样？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顺便说一句，你肯定是一位隐藏自己的上帝。这句话直接出自一位旧约先知之口，并承认了这一切的前提，即上帝在某种程度上是隐藏的，也许隐藏的程度相当大。

但就默里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它降低了威胁的重要性，因此保护或确保了人类选择上帝的自由。现在，一位名叫洛弗林的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并批评了默里的做法。

他说，默里的方法最终失败了，实际上为得出上帝不存在的结论提供了依据。洛夫林的论证如下。首先，他总结了默里的论证。

它基本上是说：首先，我们有能力培养道德品质。其次，如果上帝不是隐藏的，那么我们就没有能力培养道德品质，因为我们会被迫相信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因此，上帝必须隐藏起来，才能使这种道德成长成为可能。现在，根据洛夫林的说法，默里提出了几个关键的元伦理假设。一个是道德与上帝的命令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第二，行为的道德地位并不由人类的信仰决定。洛弗林认为，虽然被胁迫是丧失培养道德品质能力的一种方式，但并非唯一方式。因此，他承认默里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胁迫或强制会损害我们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能力。

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如果你采用 Murray 的方法，他说这方面的其他危险之一就会出现。Lovering 说，另一种让你失去培养道德品质能力的方式是通过他所说的对行为的道德地位的无知。如果你对自己应该如何生活无知，那么你就无法培养出道德品质。

换句话说，自由选择善恶行为是培养道德品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选择道德上善行的意图。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善，就没有人会打算做好事，对吧？所以，你必须知道什么是善。

洛弗林认为，默里没有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哪些行为是正确、哪些是错误，那么他或她就没有道德发展的能力。因为对善恶的认识是道德意图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上帝是隐藏的，那么关键点就在于此：如果上帝是隐藏的，那么有些人就会理所当然地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从而变得不知道什么是善。

他们将成为道德虚无主义者。因此，神圣隐秘的整个概念一手拿走，一手给予。也许，你知道，我们承认它通过降低威胁意义来减少强迫，但它也带走了对道德善的某种确定性或信心。

换句话说，人们将无法有意愿去做好事，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任何真正的善行，因此，他们将无法在道德上成长。所以，根据洛夫林的说法，默里无法两全其美。洛夫林的结论是，如果上帝是隐藏的，那么我们就没有能力培养道德上重要的品格，这是一个可怕的损失。

因此，由于上帝的隐匿性和上帝的非隐匿性都意味着我们无法培养出道德品质，因此与我们可以培养出道德品质的第一个命题相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洛弗林得出结论，上帝不存在。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无神论的论据。

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个论点呢？上帝如何能确保人们知道什么是道德善，而不让自己显得如此清晰和明显，以致于我们不得不选择他？我们被上帝的现实所淹没，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由去选择他。上帝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洛夫林忽略了一点，我认为这是他论点的致命弱点，那就是自然法的概念，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即上帝在人类心中写下了对是非善恶的基本理解。他将其融入人类的理解中，以便人们能够基本理解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

你甚至不需要上帝的书面启示就能知道基本的是非对错，知道美德与恶行、善与恶、善与恶的区别。所以，洛弗林驳斥了这种观点。他确实简要地考虑过这一点，但他在只考虑了这种方法的一个版本，即通过自然秩序获得关于道德真理的神启后，就过早地驳斥了它。

但是，为什么上帝不能通过他构建人类思维的方式，在我们的操作系统、我们的认知结构中建立一种对是非对错的理解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直接和合理的观点。上帝可能通过良心或刻在心上的上帝律法赋予所有人对基本道德真理的先天认识。所以，这将是我对洛弗林论点的批评。所以，这有点关于神的隐秘。这是

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11 节，神的隐秘。